

从“助产士”到“工程师”： 柯亨对社会主义理论前提的重建

■王福生 朱雪微

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柯亨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论证已经不具有说服力,因而必须在为社会主义进行道德辩护的同时,寻找重新建构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在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柯亨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分为切入点,指出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赋予其“分娩论”的性质,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分娩论”滥觞于黑格尔的思想,强大且危险。在柯亨看来,走出“分娩论”的泥淖是重建社会主义的前提,做出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具体的社会主义规划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

[关键词]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分娩论;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规划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6)12-0014-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激进左派复兴共产主义观念的批判性研究”(15BZX015)、吉林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

王福生,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雪微,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吉林长春 130012)

在国际社会主义面临质疑、处于低潮之际,柯亨在为马克思主义进行道德辩护的同时,也一直在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在反思的过程中,柯亨发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更“科学”之处在于,它洞晓自己由社会现实本身产生,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实现的完成。在柯亨看来,正是这种“科学性”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分娩论”的特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分娩论”滥觞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迷失了方向,它的错误已然带来严重后果:将社会主义的到来视为必然,静待社会主义的自现,却不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努力。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进行修补不是柯亨的目的,重建社会主义才是柯亨思想的题中之意。于是,问题就变为:怎么

重建社会主义?在柯亨看来,走出“分娩论”的泥淖是重建社会主义的前提,在对社会主义进行道德辩护,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做出具体的规划和设计,为普罗大众撰写符合社会现实的食谱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娩论”泥淖

柯亨从阐释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分入手,为揭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娩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埋下伏笔。柯亨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最详尽的区分出自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柯亨赞同恩格斯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只有在经过空想阶段之后才能发展为科学,并且给予科学社会主义极高的评价:“社会

主义不仅仅发展成科学的理论，而且其本身就是一门科学。”^{[1](P56)}但是，在柯亨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误解了真正的“科学性”，从而赋予了其理论以“分娩”式的性质。

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是什么？根据柯亨的观点，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自我认识的不同。空想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自我认识，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转变，也没有理解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将自己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只将无产阶级视为应该被解放的客体，而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其实也是解放自身的主体。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体现在它洞察到社会主义将由社会现实本身产生，即资本主义必然冲破自身完成自我毁灭的过程，从而孕育出社会主义，并将无产阶级视为革命的代理人。

根据柯亨的论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这种“科学性”具有“分娩”的性质，即改革是从资本主义的母体中接生出社会主义的产儿，为此将其称为“分娩论”。在柯亨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这种的“分娩论”类似于“助产士”的行为，即无须考虑将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中接生出来的方式，只需助其自然生产即可；柯亨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比作“工程师”的行为，即在推翻资本主义的空地之上重建社会主义。柯亨恰恰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工程师”行为具有“科学性”，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助产士”行为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学性”。

首先，柯亨引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的一段话，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于现存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的，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存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2](P798)}对于上述论述，柯亨用分析的方法将其分解为三条推论：

p：关于社会的思想，它产生的广泛的重大变化，是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的回应。

q：只有当且仅当生产方式变得不合时宜，即不再适应生产的需要，批判这一方式的观点才会广泛出现。

r：当生产方式变得不合时宜（且批评观点因而产生），改造生产方式以重新适应生产需要的手段将会在现存的生产方式中找到。^{[1](P71)}

柯亨猜想恩格斯从p中推出q，进而从q中得出结论r，但柯亨认为，我们并不能确定p、q和r的真实性。

第一，柯亨质疑从p中推导出q的真实性。因为对生产方式的批评可能并不是广泛地出现，而是循序渐进地产生，况且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早期，这种对生产方式的批评和对受害者的同情就已经存在了，并不能将其视为生产方式不合时宜的产物，尽管这一分析不能反驳p，但是这足够反驳q。

第二，即使p和q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明r的正确性，即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蕴含在问题之中。

第三，q中的“不再适应”的表述存在模棱两可的嫌疑，即对q存在绝对理解和相对理解两种解读模式：如果从生产方式绝对不能适应生产需要的方面理解，那就不存在一个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模式（旧模式已绝对不能适应）；如果说仅是适应程度的问题，即从比较的意义上理解，那么可能存在新的更好的模式。柯亨认为，恩格斯之所以对r深信不疑，原因就是恩格斯徘徊于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穿梭于绝对的理解和相对的理解之间，结果必然认为，一种失去活力的模式会被新的更有活力的模式取代。按照柯亨的观点，这种对r的信心并不能为新模式蛰伏于旧模式中提供有利的证明。

在柯亨看来，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在本质上是一种“分娩”式的论断。恩格斯自认为上述论断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即“思想的变化反映了生产方式的变化”，进而指出当生产方式难以满足生产力的需求时，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将从旧的生产方式中产生，而且变革的手段将在旧的生产方式中显现。但是，柯

亨的观点与之相反,他主张,新的发展方式要从基本原则推导出来,而不是孕育在现存的旧的生产方式本身中。这就可以看出,柯亨反对恩格斯的“分娩”式的“助产士”理论,而把找出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视为革命实现的手段。

其次,柯亨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论断,进一步阐述经典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分娩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的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P3)}

在柯亨看来,马克思的这段话滥觞于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以自我实现的方式来自我毁灭,用产生新事物的自我毁灭的过程来自我实现。”

^{[1](P59)} 柯亨将此视为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延续,指出马克思在这方面从未实现对黑格尔的超越,并认为这一理论既强大又危险,它使科学社会主义陷入“分娩论”的泥淖,使得科学社会主义有失“科学性”。在柯亨看来,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美好构想并不是乐观主义,真正的乐观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娩论”,因为它把寻找社会主义的道路描绘得如此之易,新的社会形态本身就孕育于旧的社会形态之中,只要静待社会自身的演变就可以了。

通过上文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柯亨虽然赞同空想社会主义存在不足之处,但他认为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在于结合现实境况,对社会主义做出可行的规划和设计,当务之急是寻找建构社会主义可信性和实施的可行性手段。因此,在柯亨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恰恰是对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工程师”式的对社会主义的建构,而非经典马克思主

义的“助产士”式的静待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孕育。柯亨认为,以上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两个论述,均是黑格尔思想的流溢物,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因充满了黑格尔的味道而失去了“科学”的意味。

二、“分娩论”的滥觞——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根据柯亨的观点,经典马克思主义因为其自身的黑格尔背景而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改造,其内仍留有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并且“分娩论”思想的一个渊源是黑格尔的一个数学观点。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看来,辩证法具有不明确的含义,只有分析的方法才是一种明晰的方法,辩证法不是科学的推理,而是谬误的推理,所以柯亨必然主张走出滥觞于黑格尔思想的社会主义的“分娩论”。

首先,按照柯亨的逻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改造,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依然保留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结构框架,只是将黑格尔的唯心论内容替换为马克思的唯物论内容:即将人类意识自我发展的历史替换为人类劳动的历史,将历史发展的路径由意识替换为生产力,将发展的媒介由文化替换为经济结构。在柯亨看来,历史是黑格尔用来阐述自己辩证法的宏大背景,黑格尔的这种世界精神在意识中自我发展的历史哲学与其以自我实现的方式来自我毁灭的辩证法是统一的,即辩证法与历史的统一。依照柯亨的想法,既然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历史发展方法与辩证法作为其合理内核吸收,那么其主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必然流有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血液,而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也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一脉相连。

其次,虽然柯亨对马克思将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法国社会主义对美好社会的现实幻想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的动态分析三者结合给予了高度赞扬,但是柯亨看到经典马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辩证法路径是战胜资本主义的主要方法，这种辩证法在某种程度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继续。柯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事物按照其内在固有的本质，并通过向外展现的方式谋求自身的发展，在其本质充分展现之后，它就会走向灭亡之路，并以另一种后续的形式继续发展，这是一种用自我毁灭来完成自我实现的方式，是以旧事物的自我毁灭来实现新事物的自我完成的过程。在柯亨眼中，黑格尔的思想固然博大精深，但也难以摆脱思辨的幻想，最终沉迷于哲学的浪漫主义而无法自拔；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科学的推理，而是谬误的推理；辩证法并不具有科学的明晰性，不明确性是辩证法的致命弱点，真正具有明晰性的方法只有分析的方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会冲破自身的束缚完成自我转变，进而达到更高一级的社会，这种辩证法思想滥觞于黑格尔的以自我实现的方式来自我毁灭的辩证法思想，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分娩论”的肇因。

再次，柯亨引用《精神现象学》中的三段话，进一步论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娩论”源自黑格尔的一个数学观点。在柯亨看来，黑格尔反对标准数学的原因在于，标准数学只论证了其原理的正确性，并没有指出原理正确性的原因，但黑格尔只是将问题归于“解决的方法从问题中发展而来”，并没有对问题的必然性原因给予应有的解释。柯亨将黑格尔关于解决方法来自问题本身的论断分析为三个命题，并由此过渡到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娩论”的分析：

(1) 如果一个(真实的)问题存在一个解答，那么当(且仅当)问题以完全发展的形式呈现出来时，解答才会被发现。

(2) 一个(真实的)问题始终存在一个解答。但是，依据(1)，当(且仅当)问题以完全发展的形式呈现出来时，解答才会被发现。

(3) 一个(真实的)问题，在其发展完成时，且仅在此时，会提供其解答。问题的解答是问题完全发展的结局。^{[1](P79)}

柯亨指出，第一个命题是第二个命题的前提，第二个命题是第三个命题的前提，三个命题的强度依次递增。

按照柯亨的观点，黑格尔对传统数学局限的批判可以称作对上述命题的理论解读，马克思只是将黑格尔的理论解读用于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批判的政治解读：命题(1)解答了空想社会主义没能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合理方法的原因，即当时社会问题自身未能充分发展，因此解决的方法也未能清晰；命题(2)进一步揭示了解决的方法终将会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命题(3)进一步指出解决的方法与问题共生，方法内涵于问题之中——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答案。在柯亨看来，对这三个命题的社会解读与上节中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两个论断具有一样的乐观主义，而命题(3)的乐观主义与恩格斯论断中命题_r如出一辙。

经过深入研究，柯亨认为“分娩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根深蒂固。

首先，柯亨从马克思致其父亲的一封信谈起，指出马克思对标准数学的批评是对黑格尔数学观点的亦步亦趋，是对黑格尔斥责标准数学“问题与其外生性解答之间的两重性”^{[1](P82)}路径的复制，并未有丝毫超越。

其次，柯亨以马克思在《莱茵报》的一篇名为“集权问题”的文章为依据，进一步指出，对时代问题而言，主要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只要是已具有现实性的问题就可以找到答案。根据柯亨的论述，马克思进行的社会革命仍然局限于意识领域中，以“分娩论”的视域看待社会革命，即确立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母体中接生出新的社会主义的产儿这一意识是改革者的任务。这一任务具体展现在马克思给卢格的一封信中，即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4](P416)}。

再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说道：“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5](P106)}经过上述分析，在柯亨看来，马克思将黑格尔关于概念问

题的学说投射到社会和政治领域,完成了对黑格尔关于“问题的解答在于其自身的充分发展”的理论解读和政治解读的合一,是政治和“助产士”结合——“政治助产士”。

总之,柯亨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政治助产士”的“政治分娩论”思想是黑格尔思想的直接继承,并且这种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在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经典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时代的挑战。“政治分娩论”的大部分事实性依据已然不具有说服力,只有抛弃“分娩论”,寻找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才是当今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三、走出“分娩论”的泥淖——重建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在修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为马克思辩护,而是在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根据上面的论述,柯亨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分娩论”之中,这种“分娩论”使得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难以为继,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有效方案就是重构社会主义。“分娩论”理论自身的错位、产生的负面后果及其事实性论据的瓦解,都足以证明不走出“分娩论”,社会主义终将沦为乌托邦的假设。为此,柯亨呼吁走出“分娩论”的泥淖,在他看来,这是重建社会主义的前提。

首先,柯亨从“分娩论”的错误性和产生的后果出发,向我们揭示了走出“分娩论”的必要性。他以罗莎·卢森堡一段长话的前后两部分为论据,阐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的“分娩论”的错误性。卢森堡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应当……在提出任务的同时,也提出其解决的办法。”^{[1](P98)}柯亨认为,卢森堡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后半部分肯定了“分娩论”。但是,20世纪的苦难历史足以证明“分娩论”的错误性,因此,柯亨认为,乐观地看待“分娩论”是危险之举。

根据柯亨的观点,“分娩论”不仅是错误的,

而且这一理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第一,“分娩论”的必然性会揭示未来的政治景象,不需要对未来有多样的憧憬和计划,政治的不确定性和艰难选择都是多余的。第二,支持这种“拱手之易”的政治实践的“分娩论”都是对“分娩论”做出的庸俗解释,即它可能会或多或少地“缩短和减少”因新社会来临而产生的“阵痛”等,而我们经历的“阵痛”实际上仍在继续。第三,不论“分娩论”是否鼓励了社会主义的策略,但它确实忽视了社会主义的规划和设计问题,而这一点在柯亨看来是最致命的。柯亨赞同卢森堡话的前半部分,指出卢森堡揭示出对社会主义不能做出僵硬不变的规划是对的,但不是完全不做规划,根据现有的社会现实条件进行规划是必要的,“我们确实无须写出僵硬不变的食谱”^{[1](P99)},“但是,我们必须写出食谱”^{[1](P99)}。在柯亨看来,社会主义发展的挫折历史向我们证明,要想明晰如何处置权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吸引广大群众并使之追随,就必须对社会主义做出规划,否则社会主义终将遥遥无期。

其次,柯亨论述了“分娩论”事实性外壳的退却,使得“分娩论”丧失了事实性的依据。根据柯亨的观点,经典马克思主义有两大事实性外壳,使他们相信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确保未来社会主义实现物质平等的条件: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确保了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阶级条件;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物质财富十分充裕,是社会主义实现的经济基础。但是,就现实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证明科学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的两个事实性外壳正在破裂,这使得它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远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大了。柯亨从平等的价值观入手,揭示出马克思如何失去了“分娩论”的事实性外壳。

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事实性外壳,柯亨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娩论”基于对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合谋必然实现的确信,这种合谋是柏拉图力图实现的哲学与权力相结合,但是这种合谋尚未实现,也不会实现,社会主义必将从资本主义中孕育而生的“分娩论”同样

也不会实现。

在柯亨看来，无产阶级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无产阶级从未像《共产党宣言》所预言的那样成为‘压倒性多数’”^[1](P133)]，“无产阶级不曾，也不会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言的联合与影响力”^[1](P144)]。所以，在柯亨眼中，无产阶级从未真正形成，未来也不具有形成的现实性，无产阶级并未获得在世界的普遍性意义，也不会获得世界的普遍性意义。

柯亨认为，当今社会已经不会出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集“多数”、“生产”、“受剥削”、“贫困”、“无所可失”以及“革命”等特征于一体的革命主体，这些特征正在离散，尤其是“受剥削”和“贫困”这两个特征的离散，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过去未曾出现的规范性问题，即无产阶级这个概念的定义的规范性问题受到质疑。因为在现今的社会中，受剥削的人可能并不贫困，而贫困的人可能也并未受到剥削，既对社会主义抱有希望又具有现实的实现力的群体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的“分娩论”将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无以为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寻找革命的主体不同，柯亨认为革命的主体或许不重要或许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的重建首先要从这种“分娩论”中走出，然后在于给予社会主义以可欲和可行的计划。

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事实性的外壳，柯亨指出，物质财富的充裕与生态危机的关系问题足以证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不能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分娩论”的事实性依据。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可以带来物质的充裕，但是物质财富的充裕又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而使生态环境免遭其害的方法必然是降低物质的消耗，而这势必又会限制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足以证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天方夜谭。而马克思的“分娩论”建立在物质财富十分充裕的基础上：未来社会必然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足以确保每个人生活所需

的一切，使得每个人都实现自由发展。但生态危机与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矛盾，使社会主义必然从资本主义孕育而出的“分娩论”不具有说服力。根据柯亨的看法，马克思的物质乐观主义必然造成社会主义可能性的悲观主义，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从这种乐观的“分娩论”中走出，在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同时，寻找另一条具有现实性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柯亨看来，在物质匮乏的今天制定出可欲的和可行的社会主义的计划是唯一可以行得通的道路。

四、结语

综上所述，柯亨的目的是要挽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经典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进行修补已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主题，重建与当今时代发展相契合的社会主义才是这个时代的哲学精神赋予我们的任务。根据柯亨的论述，在物质匮乏的今天，在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主体尚未形成的今天，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娩论”毫无说服力可言；而走出“分娩论”的泥淖是重建社会主义的前提，在道德上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做出辩护，坚定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的信念的同时，制定可欲和可行的计划是重建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

[参考文献]

- [1](英)G.A.柯亨.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M].霍政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赵 伟]